

13104

莆田文史資料

第七輯

(内部发行)

5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

47149/05

莆田文史資料

第七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

福建省涵江第一印刷厂承印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新四军教导总队·····	蔡 园 (1)
江口上林亭“截钞事件”纪实·····	康金树 (8)
我的战友与老师——叶良运同志 殉难周年祭·····	林汝楠 (17)
回忆陈国柱同志和我数十年的 交情·····	姚敏龄 (24)
举红旗，壮怀激烈斗奸邪 ——回忆三十年代闽中游击队几次 重要军事行动·····	王 福 (26)
莆田盐场税警武装起义记略·····	翁文樵 (31)
地下党涵江联络站概述·····	陈长城 余济沧 (40)
回忆地下党梧坑联络站·····	陈祖燕 (49)
无名氏革命诗稿·····	(53)
革命诗钞·····	杨采衡 蔡园 林汝楠 (59)
陈绍宽莆田之行·····	郑玉华 (67)
涵江中学和莆高分校二、三事·····	郑秉钲 (75)
给张琴的二封信《桐云轩声画集》 诗评·····	廖 华 (81)

回忆黄埔母校黄铁雄(95)

回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曾兆荣(104)

柳园卓氏骨科武科成功之道卓承琪(107)

从一份《福建省乡试录》看

“文献名邦”莆田.....(台湾)李莫言(111)

“无双毕竟是家山”陈长城(117)

《莆田县令春秋》新编(下).....文如许(121)

国民党莆田县政干所纪要许元培(125)

人民银行县支行的创办和

初期业务.....黄寿海(129)

北洋军阀在莆田的经济搜括.....陈长城(138)

莆田县学联会的筹备与成立.....柯文溥(145)

莆田私立博文初职的创办与

发展蔡金耀(155)

采风三十年蔡华仁(168)

四十年的回忆琐记童复元(173)

基督教传入莆田史料(二).....陈绍勋(178)

民国时莆人任县长简况表蔡 麟(187)

新四军教导总队

蔡 园

新四军教导总队于一九三九年暮春，分别进驻中村河两岸的各大祠堂和中村周围的各自然村里，总队部设在中村。教导总队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一所新型学校。八路军在延安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设有抗日军政大学和它的分校。新四军在皖南地区所设立的这所学校，则称为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的前身，是新四军教导营，一九三八年一月成立于南昌。营长是刘世相同志，营政治委员是龙树平同志。营辖一、二、三各连、学员约三百余人。不久，随军部移驻太平县。是年四月间，又转至泾县左坑、云岭等地。为了适应敌后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抗战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亟须造就成千上万的军、政、文骨干，以支援和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报经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遂于一九三九年春，以教导营为基础，扩建为新四军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长是由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兼任；总队政治委员是由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兼任；教育长是冯达飞同志，他是主持军、政、文日常训练工作的。

教导总队部设训练、政治、队列各处。训练处长是赵希仲（皖南事变时叛变），副处长是薛暮桥同志。政治处主任是余立

金同志。队列处处长是张元寿同志。各处还增设各业务科室和总俱乐部等。

教导总队下辖一至十三队。八队为女生队，九队为高干队，十三队为青少年队。为加强对各队的军政领导，第三期末还增设一、二两个大队部。一大队为军事队，下辖一、二、三各队，大队长是贺敏学同志，大队政治委员是刘文学同志。二大队为政治队，下辖四、五、六队，大队长是饶守坤同志，大队政治委员是张闯初同志。

现将教导总队及所属各队驻地分布状况和各队主管人员以一九三九年秋季第三期为例，叙述如下：

一队长严昌荣同志，驻水南渡秋阳祠堂；二队长袁大鹏同志，驻孙家祠堂；三队长樊道余同志，驻欧阳祠堂；四队长蔡园同志，驻懋公忠祠（即徐家祠堂）；五队长黄永川同志（皖南事变时失散未归队），六队长田长华同志，两队均驻午朝门；七队长杜平同志，驻清水湾；八队长于晶同志，驻震老官，临时又增设八二队，驻上阳山；九队长黄元庆同志，驻石头尖；机枪连长蔡××（皖南事变时叛逃），工兵连长王自忠同志，均驻汤家祠堂；十三队长唐坤元同志，驻下阳山董家祠堂。（暂缺政工人员名单）

为了加强机枪手的培训，是年秋后，从前方战斗连队里抽调若干机枪手，编为集训队，由教导总队派出军事教员进行训练。该集训队驻秋阳门里。另附特务营分驻黄金田一线，向包村敌伪顽方向警戒。营长是林维先同志。

教导总队是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团结、紧张、严肃、活

泼”的校训为队训的；同时也以毛主席为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证书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作为学员的座右铭，以加强提高学员革命意志的政治思想教育。

教导总队的学员，多为来自上海、镇江、南京、杭州、温州、宁波等江南各沦陷区的抗日爱国的男女知识青少年。他（她）们别了双亲和兄弟、姐妹，走出田庄和课堂，冒着敌人的炮火，偷越敌伪严密的封锁线，来到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皖南，进入这所新型抗日的军政学校学习。学习时间一般为三个月至六个月不等。

教导总队的教学计划、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基本上与延安抗大相同。在理论教育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融汇贯通，灵活应用，不死背条文。在军事技术训练方面，则要求精讲多练，反复苦练，课堂讲授与课外实兵相结合。在教育方法上，贯彻军事民主，官兵互教。

政治教育内容以《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统一战线》、《民运工作》等为主要课程。从理论、阶级政策、民族政策等方面进行启发教育，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军事教育以《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地形学、兵器学以及班排连战术、战斗技术等基本动作为内容，以培养军事指挥员具有新型军队的革命素质和军事修养，要求灵活应用战术原则和战斗动作。对坚持在南方八省游击战争的和从延安来的男女学员，则辅以必要的自然科学、历史知识等为内容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

教导总队十分注重教育计划和选派军事、政治、文化教员。专职教员有：夏征、姚耐、陶白、罗琼、张国梅、汪溪、杨瑞年、陈铁军、谢忠良、张日清、郑福生、王曦亭、杜剑秋、张加和蔡园（第三期时调任四队长）等同志。叶挺军长还从国统区聘请军事、技术教员。兼职教员有：薛暮桥、朱镜我、冯定和彭柏山等同志。还有众多的军事、政治、文化干事住队进行课外辅助教育。

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和袁国平主任等领导同志，常来总队作关于抗战形势与当前任务等专题报告。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亲临皖南战地视察时，在叶挺军长的陪同下专程来教导总队视察和检阅学员队。

教导总队对实兵对抗演习十分重视，经常进行步兵班、排、连攻防对抗演习，以培养和提高指挥员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

教导总队还于是年秋，正是皖南枫红桑绿的季节，举行了秋季实兵大演习。教导总队以一、二、三队编为红军，四团二营（可能番号有误）扮演蓝军，进行不预期的营遭遇战斗。经过一整天的实兵对抗演习，达到教案的预期目的。最后由教导总队兼总队长周子昆、教育长冯达飞分别进行实兵指挥演习、讲评和总结。周兼总队长着重指出：进行军事学习和野外实兵对抗演练，是为着学习战斗本领去战胜敌人，是为着保卫祖国而奋斗、流血、牺牲，是为着民族解放应尽的职责。有了这样的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就能以旺盛的革命意志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建设新中国。

教导总队的学员在学习上紧张的：每当晨曦初上，各队就

集合在大操场——石埠桥大操场上，进行紧张的队列训练和战斗动作练习。有时全副武装，以班、排为单位进行越野跑步或登山竞赛。首先攀登山顶的班、排，予以鼓励和嘉奖，从而增强学员的体质。每周还举行夜间紧急集合，以检查战备思想。在日常生活管理上，严格执行条令条例，认真贯彻集体化、军事化的管理教育。各队早操之后，就分散在中村河两岸，取水洗漱。在寒冬腊月里破冰汲水，虽手脚冻得冰冷，全不叫苦。学员每人每天伙食费标准是一角二分，这是对青年学员的优待和照顾。前方抗日将士，战斗在沦陷区里，在频繁的战斗中，指战员的伙食费每人每日仅为一角钱。国民党嫡系部队，如五十二师，每月经费高达十八万元之多，而我新四军以一军之众，关饷每月仅十二万元。一九三九年底，连这一点微薄的经费、被服，均被停发。我军指战员生活是极其清苦的，虽时届寒冬腊月，仍脚穿草鞋，单衣短裤，戎装单薄，确实难以御寒。

教导总队的男女学员，在学习上，既无课堂，又无桌椅。个个都用稻草编成一只圆形草垫，席地而坐。每当上政治课时，炎夏则集结在树荫下或找遮阳之处以防暑，寒冬则集结在骄阳照耀的小山岗上以取暖，以野外为课堂。学员们双膝弓曲，作为临时的课桌，或聚精会神听讲，或俯首疾书作笔记。在上军事课时，常在野外各种地形上摸、爬、滚打，认真地在利用地形地物。在训练射击时，尽量发挥射击火力，力求隐蔽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既是战斗动作的要求，又是一条军事原则。

教导总队各学员队，十分重视晚点名制度。在新学员入伍一个月内，要求各队长、政治指导员在进行晚点名时，从一班到九

班，不仅不用花名册就能熟悉点呼学员名字，还要求对在队学员的籍贯、家庭状况，本人成份、学历和性格等等，都要了如指掌。在晚点名时，要对当日的学习、生活，进行表扬和评比，对明天的各种课程或战斗演练，提出明确的要求和应注意的事项。点名时间一般在十五分钟左右。周末，各队举行各种晚会：有诗歌比赛，有歌咏，有讲解前方作战的战例，也有讲工农红军长征中的革命故事。月末还进行时事政策测验等等。学员的学习是紧张的，但是一到周末，大家便精神奋发，兴高采烈地参加周末晚会。

教导总队对党的组织建设、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十分重视。各学员队均设有支部委员会，一般是以政治指导员或副政治指导员任支部书记。由于当时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支部委员会对外不公开，秘密进行工作。发展党员是个别进行的，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党员过小组生活时，是由小组长个别通知，约定时间分头到指定地点：树林里，或背阳的小山凹中，或沿中村河两岸稀疏的村舍里进行组织活动、汇报思想、研究发展对象的思想情况，生活检讨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教导总队还举行不定期的大会操。当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时，各队就云集在中村河湾石埠桥的一块大沙石滩上，等候检阅。大会操，通常由兼总队长或教育长任军事检阅指挥员。有时也举行阅兵式、分列式。一队队男女学员，精神抖擞，迈着雄健的步伐，正步通过阅兵台，举军礼以致敬。雄健而整齐的步伐，伴着高昂的口号：“英勇杀敌，保卫祖国！”一队跟一队分别通过检阅台，最后，由检阅指挥员进行讲评和嘉奖。

星期天，学员们整理内务之后，分别请假外出。有的沿着中

村河畔，迎着东方初日，在轻歌漫步，领略这河水泛绿，远山含黛的风光秀色；有的三三两两并肩踟蹰于石埠桥畔，娓娓交谈，交流学习心得；有的表达豪情壮志，倾吐毕业后上前线抗战杀敌的决心；有的则匆匆上路，前往震老官八队驻地，会见从沦陷区一道来皖南参军的女同学，他们漫步于桑园、梨下，叩询家书、乡情；有的则在中村军人服务社购买日常用品，为学习上、生活上解决某些短缺；有的则去总队部医务所探望患病同学，献上映山红，致以慰问之意；有的则三五成群，兴致勃勃地奔向章家渡，饱览和眺望那如玉似锦的青弋江。啊！那碧波涟漪，细流潺潺；看！那远近青山，点缀着丛丛簇簇的四月杜鹃花，犹如骄阳初上，映红了兰天。这一帧帧，那一幅幅，使人心往神怡，留连忘返……但是，多数的同学仍然留在队上，复习功课，或整理笔记。星期日虽然没有上课，但每个同学都度过极有意义的一天。

教导总队学习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为了抗战，他们肩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准备奔赴前方，英勇杀敌！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不断地在攻城略地，屠杀人民。日寇竟于一九三九年“七·一”，三番五次派飞机侵犯我云岭军部，中村河总部一带领空，投弹轰炸。我八队学员冯玲同志在敌机轰炸下光荣牺牲，徐德同志和医务所的许多病员，身负重伤。日寇这一暴行，激起了教导总队全体学员无比的愤怒，复仇的火焰在胸中燃烧！齐声振臂高呼：“要为死难同志复仇！”这愤怒的吼声，震撼着中村河两岸的山山水水……

中村抛头颅，

（下转第16页）

江口上林亭“截钞事件”纪实

康 金 树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竟勾结美帝，公然破坏国共和谈协定，调兵遣将，集中几百万正规军，大举向我解放区进犯。福建省反动派也调保安团继续向我省委机关所在地的闽中及其他地区进行“围剿”，妄图扑灭我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力量。我们为了生存，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当时，省委书记曾镜冰同志在给省委机关和部队作了政治思想动员报告后，根据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先把机关和游击队的革命武装力量，实行化整为零，分散掩蔽。提出的口号是：“赤手成家，自力更生，隐蔽生产。”把武装力量分成几路，深入基层，到各县去坚持地方斗争：一路由叶良运同志带领闽北来的一些会打仗的同志，同饶刚生同志一齐到永太和闽侯交界地区去生产隐蔽；我带领一路武工队到福清和莆田交界的金芝、泗洋、牛目、南坛和江口一带进行活动，跟群众在一起生产，坚持地下斗争；林汝桀和陈家唐同志带领一路到福清和闽侯交界处去生产隐蔽；祝增华同志带领一路到南安地区去活动。省委机关由曾镜冰书记亲自率领，从长乐县的江田、南阳一带，转移到闽侯县的尚阳区、福力大队南阳村十八重溪一带活动，在那里隐蔽生产，领导整个革命工作。经过一再努力，冲破重重困难，各路都做出了一定的成

绩。机关特务连的同志们也向附近山沟深林里挖掘“茹榔”（染鱼网用的原料），运到福州等地去售卖，换些粮食回来维持大家最低的生活。他们在大山沟里搭草棚居住，隐蔽生产，生活十分艰苦。严冬气候，天寒地冻，大家只穿单衣过日子；夜间睡觉，仅用干草作垫，上盖被单；有时冻得无法，只好烧些柴火取暖。大家都饿得面黄肌瘦。有一次，战士们挑了二十多担“茹榔”，爬山越岭，运到闽江江边时，碰到敌人，遭其开枪射击，结果这批用血汗挖运的“茹榔”全部丢失了。第二天，敌人把江边封锁了，並派兵上山到处搜查，放火烧山，捕杀我革命群众。这时，对敌斗争越来越艰巨，困难也越来越多。怎么办呢？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粉碎顽固派的进攻、“围剿”，曾镜冰同志亲自出马，化装到福州，同闽江工委黄晟禹等负责同志共同研究对敌斗争任务，特别部署筹集款项的斗争办法，以解决全省的经费开支和革命同志生活上的困难。刚好我们从敌人内部获得可靠的经济情报，说是反动当局每个季度都要拨运一批数量可观的现钞去厦门（抗战后，沿海公路破坏不堪，每次运送钞票，都是派兵押送，步行去厦门）。曾镜冰同志得到这个机密情报后，经研究立即决定，抽调一个精干班的武装力量，到江口至涵江这一线去截缴这批现钞。参加执行这个任务的有黄国璋、叶良运、林汝楠、康金树、任国信、施章干、黄国珍、郑永正、蒋阿光、义武、林国金、张兴来和罗智光等十三位同志，携带一挺轻机枪，十一把卜壳枪。机枪子弹只有三百发，卜壳枪子弹也很少。叶良运同志所带的子弹最多，但也只有四十发，加上一颗手榴弹。其他同志只有二十多发。这次筹款行动是在白天，要跟敌人面对面，准备刺刀见红。

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不是我们吃掉敌人，就是敌人吃掉我们。因为在江口，敌人有两个排，配备四挺轻机枪在那边把守；涵江又有敌人的重兵驻防。我们由永太兔耳山出发，到达莆田江口厚峰乡中垵村的一座小庙宇，住了一、二夜，觉得此地离公路太远，乃秘密转移到江口镇附近蔗车村余先觉同志家。余的屋边有一座三教祠。先觉同志平日以抬轿为生。他家离公路只有三、四十步，离上林亭三里左右，单独一户，不易暴露目标，是个最理想的地点，三教祠旁有一舆地先生（俗称“地理先生”）。大伙假称是拜奉三教的信徒，前来上香的。以后又经过侦察，选择对我们有利的地形、地物，决定在距江口约五华里的“上林亭”（福厦公路八十七公里处）和敌人决一死战。我们在余先觉同志家等了一个多月，生活大部份靠余先觉同志每天起早摸黑去抬轿，赚些钱，买些粮食，连同他家的地瓜来维持。余先觉同志的母亲也积极为我们张罗膳宿，每天都得替我们到河边去洗地瓜，煮了供我们吃。这也引起群众疑诧，为啥先觉家只有三、四个人口，而每天吃这么多的地瓜。先觉母亲机警地假称说是喂两只大猪，这样混瞒过去。曾镜冰同志则在福州坐镇指挥，并派黄梅英同志当我们的交通联络员。黄的任务是从福州跟在押送现钞的敌人后面，到了江口，迅速向我们汇报情况。梅英同志是一个廿五岁左右的姑娘，路上怕引人注意，假妆为已出嫁妇女，头上梳个乡下妇女的发髻，象中年老太婆一样，身穿蓝色本地衣，头戴麦杆笠。

当时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亲自批拨的这笔运去厦门的现款，为数二亿元“法币”，抽调十名精干的班长级以上的宪兵，配有卡宾枪等新式武器押送，由其银行经理（随带太太）率领。

他俩坐着竹轿，沿途监运。八担现钞由八名挑夫挑着，钞票是用麻袋装的。他们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从福州出发，到福清渔溪过夜。第三天（农历正月初七日）中午在江口观埕尾吃饭。带队的敌人说：“江口到涵江还有二十华里，途中有一段路靠近山边，时有土匪出没，子弹要上膛，枪要放在肩上，绝不可麻痹！”（这是黄梅英同志向我们汇报时说的）当我们得知敌人正将经过我们预先选择的伏击地点（上林亭）时，我们正在研究袭击策略，连午饭也来不及吃，就准备出发。这时刚好有些人在三教祠拜神，我们一伙如果出去，又会引起人们疑诧，于是先觉同志的母亲和先觉想个办法，拿出破红毡，展开起来，象在抓跳蚤样子，将三教祠的边门遮住，让同志们从容出发，到达袭击地点。一架轻机枪卷在草席内。同志们化装成观看元宵的游客，按预定计划，陆续分组出发，到“上林亭”的茶饼店休息，准备截击。下午三时半左右，运送钞票的敌人走近时，机枪组任国信和施章干立即把机枪架在附近厕所的墙上。这时，敌人两名尖兵发现了我们，我们迎上前去，敌人一面喊叫“站住”，一面开枪射击。我们机枪组立即回击，但没有向敌人后面的主力射击，而是向前面的两个尖兵射击。一个尖兵手被打断，倒在沟中；另一个尖兵冲了过来，躲在一座房屋后面，向我们射击。这时，那个经理太太手臂被打伤。挑夫把钞票丢放在地上——敌主力的面前，使我们拿不到。看到这种情况，我马上冲过去，先把那个负伤尖兵的步枪打断，丢进厕所；又带全组三个人冲到厕所边。敌人集中火力向我们射击，子弹开花似的象雨点般地打在墙壁上，在我们身边嗖嗖地响。黄国璋同志忽被敌人开花弹射中头额，额上淌下血来。他的胞弟

黄国珍同志看到这种情况，甚为着急。国璋同志哄他说，不要紧，是被墙角砖头碰伤的，不要怕。我们一组又从麦田向前爬过去，麦禾一动，敌人就拼命开枪射击，两位同志又被击伤，离队退下（义武同志手部受伤较重，夜半爬到先觉同志家里，住约一星期，革命群众阿贵以吗啡为他止痛。义武恐怕住了太久，会株累先觉一家人，伤势比较好，就打算离开。先觉母亲再三留不住，他由大路到渔溪竹溪里再归队），于是敌人狂吹哨子，喊叫“冲呀！”

“冲呀！”我们机枪一开火，敌人便都伏下去；我们机枪一停，敌人又冲过来，还喊“抓活的！”敌人利用北面的厕所作掩护，我们占领南面的厕所作掩体，南北相距只有三十步，双方都无法前进一步。激烈的战斗坚持一个多小时左右，八担钞票始终被控制在敌人方面，我们没法抢到手。我们向敌人喊话，叫他们派代表来协商，说我们只要钞票不打人；敌人却要我们派代表过去。我们又进一步喊说：“你们是要钱，还是要命？”敌人回答说：“钱和命都要。来吧，钱就在面前！你们打死我一个，我们打死你两个！来拿吧！”看来顽固的敌人是在拖延时间，想让江口那边两排的敌人来增援。原来江口方面有两个排敌人，四挺机枪，听到此处枪声响后，就绕道开拔到观后那边去，企图截断我们的退路。而我们本来准备撤退的后路，却被不明真相、看“热闹”的几百名老百姓所拥塞，情况是相当危急。如果江口的两排敌人赶到战斗地点来，那么我们这次筹款任务不但不能完成，而且还有全被消灭的危险。我们正在着急间，忽然叶良运参谋长带了一名警卫员，从麦田沟边又绕道过去，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榴弹，刚要掷过去，伏在路边坑内的四个敌人，三个被吓跑了，其中一个开枪射

击，良运同志喉咙被击中，鲜血直喷出来，倒下去了。警卫员哭着要扶他回去，他用手势表示自己伤势重，已不行了。这时，我含着热泪，高喊“冲呀！要为叶良运同志报仇啊！”一面开枪射击，一面飞快冲过去，拖了一担钞票过来，交给林汝楠同志转到后面去。敌人又向我们冲了十几步，我再打了几枪，带同蒋阿光同志拼命地再冲过去，又拖回了一担。这一担我交代阿光赶快背走。我再冲过去，又拉到一袋。这时，林汝楠同志传达黄国璋同志的命令，说不要再抢，徒拖时间，于我们不利，赶快撤退。这时退路已被老百姓拥塞截断了。大家迅速背着五袋钞票，从房屋旁边不远的一条田埂小路撤。同志们走到一条河边，只能一个一个从河上小桥走过，人才过去一半，不幸郑永正班长头被敌弹射中，倒下去了！他背的一袋用血换来的钞票，又白白地掉到河里去，捞也捞不上了！我就把郑所带的一支卜壳枪拿下，又接过施章干同志手上的机枪，叫他帮助前面带钞票的同志赶快走。我朝天开了几枪，高声对在后面追赶的老百姓说：“是国民党的钱，和你们无关！‘正月头’（本地方言），你们安静，谁再追赶，就打死谁！”群众听后，大部分跳下河边不追了。可恶的是从江口国民党乡公所那边又赶来十几个敌人，拼命在后面追击我们，喊叫我们将钞票放下来，不准跑。一面追喊，一面开枪。我们一直撤到厚峰村的一座山麓，经过半山菜乌寺爬到山顶，这时大家已经饿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叫同志们赶快把麻袋用小刀割开，将钞票装在行军的背包内，分散背负，比较好走。我一直在后面和机枪手任国信轮流把机枪扛上山去，仍向后面追击的敌人回击。我用机枪扫射几发子弹后，才向更高的山顶爬上去。一看，机枪子弹